

# 河北大学博物馆藏西夏文铜牌考释<sup>\*</sup>

梁松涛<sup>1</sup> 李文龙<sup>2</sup>

(1.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; 2.河北大学博物馆 河北 保定 071002)

【关键词】河北大学博物馆;西夏;防守待命;铜牌

【摘要】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西夏文铜牌,其正面刻有西夏文“𐽀𐽁𐽂𐽃”(防守待命)4字,背面刻有西夏文“𐽄𐽅𐽆𐽇”(跋狗契丹)4字,应属于西夏的守御牌。本文依据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,对该铜牌的形状、尺寸、铭文等做了介绍与考证,以期推动西夏牌符问题的研究。

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西夏文铜牌,红铜质地,圆形,周边起沿,重55.5克,直径5.3厘米,厚0.4厘米,有钮,有穿,钮宽1.3厘米,高0.8厘米。此铜牌是1955年由河北大学历史系周庆基教授以5元钱收购于天津雅坚斋,原藏于历史系文物室,后移交河北大学博物馆。此铜牌正背两面均刻有西夏文字,每面2行,行2字,在金石文献中未见著录,新出版的《中国藏西夏文献·金石卷》中也未收录。今将此铜牌刊出并做相关考述,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,不足之处,敬请方家指正。

西夏牌符是西夏文物的重要遗存类型,总体数量不多。最早对西夏牌符进行著录的为罗振玉,其在1916年出版的《历代符牌图录》三卷本中收录了铜质西夏文牌符4枚,其

中“内宿待命”牌1枚,“防守待命”牌3枚。

目前已知出土的西夏文牌符数量不多,《中国藏西夏文献·金石卷》收录有20枚<sup>①</sup>,按其造型和用途可分为四种类型。

## 1、铲形宿卫牌

这类牌符一般形式为长方铲形,上部有供悬佩用的釜孔,下端成相连的两个弧形,铜牌周边起沿,正背两面均有文字,一般行书,目前所知存世的有7枚。其一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博物馆收藏,铜牌长6.8厘米,宽4厘米,厚0.3厘米,上有穿,正面刻文字2行,行2字,释为“内宿待命”,背面刻有人名“波年十月山”。其二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文物管理所收藏,长6.5厘米,宽4厘米,厚0.3厘米,上有穿,正面刻“内宿待命”4字,背面刻有人名“兀噶乐西”。其三为中国国

<sup>\*</sup>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《西夏文献文物研究》(编号:11@ZH001)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家博物馆收藏,为铲形,只是形制略大,长9.5厘米,宽6厘米,上有穿,可悬佩,正背两面刻有相同的6个西夏文字,一为阳刻,一为阴刻,可译为“宫门后寝待命”。其四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,长方铲形,长7厘米,宽4.2厘米,厚0.3厘米,上有穿,可悬佩,正面刻西夏文“内宿待命”4字,背面无字。其五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,长方铲形,长5厘米,宽3.5厘米,上有穿,可悬佩,正面刻西夏文“内宿待命”4字,背面刻西夏文人名“巴若男”。其六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,长5.5厘米,宽4厘米,正面刻西夏文“内宿待命”4字,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“讹□□铁”。其七为北京民族文化宫藏,正面刻西夏文“内宿待命”4字,背面刻双线西夏文“咩”。

## 2、圆形敕燃马牌

敕燃马牌一般为套合式,合盖上镌刻西夏文“敕燃马牌”4字,有钮有穿,可佩带。一般一面刻西夏文字,一面镌忍冬花纹图案,有的双面镌刻西夏文字。目前仅见存世两枚,其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,牌符直径15厘米,钮长2厘米,宽1.5厘米,正面有楷书西夏文“敕燃马牌”4字,背面有5个西夏文字,似为人名。其二收藏于西安市文物管理局,直径约14.7厘米,由上下两片套合而成,两端有镀金西夏文“敕”字,正面刻双勾楷书西夏文“敕燃马牌”4字,背面刻忍冬纹。“敕燃马牌”是西夏皇帝亲授处理军国要事的重要信物,是传达紧急军令的信牌,这在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已得到证实。

## 3、圆形守御牌

守御牌上有悬佩釜孔,有钮有穿,可悬佩,直径一般在5厘米左右,正面刻西夏文“防御待命”4字,单线或双线阴文,背面一般为西夏文党项人名。目前共存4枚,陕西省博物馆藏1枚,直径5.3厘米,正面刻“防守待命”,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“千叔犬”。西北

师范大学收藏1枚,直径5.2厘米,正面刻阴文“防守待命”,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“张□有”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2枚,一枚直径5.6厘米,上有穿,正面刻“防守待命”,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“□兀金奴”均为阴文;另一枚直径4.5厘米,上有穿,正面双线阴刻“防守待命”,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“千玉宝讹”。

## 4、其他圆形、铲形、马蹄形、桃形牌符

这类牌符用途不清,主要特点是一面有字,一面或有字或无字,有的为镀银铜牌。圆形铜牌有: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枚,直径5.3厘米,一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“吴哆乐有”,另一面无字;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枚,直径8.8厘米,有钮,长2厘米,宽1.5厘米,钮上有穿,一面刻有5个西夏文字,释曰“□摩河□□”,另一面无字。铲形铜牌有:北京民族文化宫藏1枚,一面刻西夏文“苏铁黑”3字,另一面刻一个双线西夏文字,音“耶”;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枚,长5.4厘米,宽4厘米,正面刻有一个双线西夏文字,音“哈”,背面刻西夏文“苏铁黑”3字;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枚,长7厘米,宽4.2厘米,一面刻西夏文“限置依”3字,另一面刻西夏文“苏铁黑”3字。马蹄形铜牌有: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枚,高7.6厘米,底边5.5厘米,周边有锯齿纹,一面刻西夏文“重诸人之”4字,一面无字。桃形铜牌有: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1枚,高6厘米,宽5厘米,上部有一圆环,中心有一西夏文字,释“信”。此外,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,编号为35988的铜牌,西夏文字释为“双庆宝饰”,似为西夏腰牌;编号为35999的,西夏文字释为“千目金尚”,“千目”即千卒头目,约为“千总”或古代的“千夫长”,“金尚”应为专名或部姓。

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这枚圆形牌符,正背面各有4字,均为阴文,正面“糴菰残蚬”

(图一 1),可译为“防守待命”,背面“砌 华”(图一 2),可译为“跋狗契丹”。此牌为守御牌,依照以往守御牌符的镌刻习惯,背面应为西夏人名,但此牌出现了“契丹”2字,是党项人名叫契丹还是指契丹国,尚需进一步考订。

牌符通常为国家礼仪之所系,因此各个时代对其都很重视,管理也相当严格。西夏王朝也不例外,在西夏法典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中,对牌符的使用、收藏及对丢失牌符者的处罚等做了详细的规定:

诸人执符而折之,曰我带银符语及所领符不带腰上而置家中等,一律徒三年。<sup>[2]</sup>

诸人执符出使处,不许藏符于怀中,致符面上纸揉皱折叠,倘若违律藏符于怀中,又揉皱面上纸等,有官罚马一,庶人十三杖。<sup>[3]</sup>

朝廷的符牌,均藏于宫中,并派人看护,闲杂人员不得打问和靠近藏符重地。待命任职人等,不许自专引无职人入于内宫、官家住处、待命者当值、信牌箭置处局分前内侍住宿处等,不许问示。<sup>[4]</sup>

诸人非以官事,因私擅自令执符者,派者当绞杀,执符者及行头字者,司吏等判断比派

执符罪当减二等。令执捕坐骑头字,有因私使之时,因私使者及行捕坐骑头字者之局分所使人等,与因私擅自遣执符之高低罪情相同。<sup>[5]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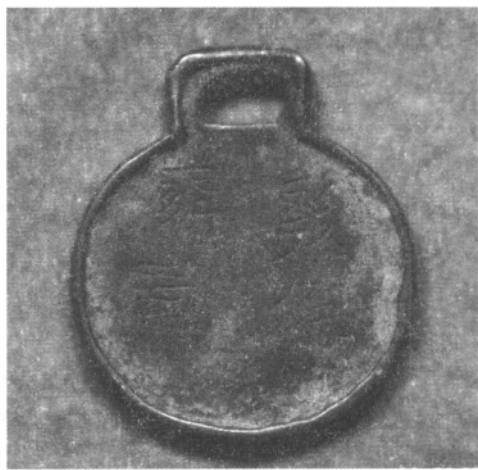
凡报告敌情,点集兵马,引伴使人,地边畿内有事奏告,唐徕、汉延等大渠水涨,催促草工、笨工,传递圣旨等,除依法派执符以外,事大小有急者,当遣神策使军、强坐骑。如果在不应派执符的情况下派时,大人、边检校、习判、承旨、城主、通判、城守等一律徒五年,局分都案、案头、司吏当比之减一等。<sup>[6]</sup>

持符出使处大意失符者,当绞杀。判断未至而得之则徒五年,判断之后得之者,徒六年。<sup>[7]</sup>

在西夏崇宗至仁宗时期的西夏文字典《文海》中,对“信牌”的释文为:“此者,官语执者诸人所信名显用,迅速紧急之燃马上用,故名信牌。”<sup>[8]</sup>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10册刊布的西夏文《宫廷诗集》第18首《敕牌赞歌》,记载了“敕走马”银牌的地位、作用及受到万国敬仰的事实<sup>[9]</sup>。西夏时期,牌符的性质和作用与同期宋、辽、金的牌符制度基本一致。《宋史·舆服志·符券》载:“唐代有银牌,发驿遣使,则



1.正面



2.背面

图一 西夏文铜牌



门下省给之。其制，阔一寸半，长五寸，面刻隶字曰‘敕走马银牌’凡五字，首为穹，贯以韦带，其后罢之。”<sup>[10]</sup>宋代有两种银牌，一为隶书银牌，“阔一寸半，长五寸，面刻隶字曰‘敕走马银牌’凡五字，首为穹，贯以韦带”<sup>[11]</sup>；另一种为分书银牌，“阔二寸半，长六寸。上钹二凤下钹二麒麟，两边年月，贯以红丝绦”<sup>[12]</sup>。辽代银牌也有两种样式，一种为“圆牌式”，上书番文“朕”字，用金镀钹成；另一种为长牌，上书番文“敕走马”，金镀钹成，大约同“长尺，刻以国字，文曰‘宜速’，又曰‘敕走马牌’”<sup>[13]</sup>。宋代周焯《北辕录》：“（金）接伴戎服立，又带银牌，牌样如方响，上有番书‘急速走递’四字，上有御押，其状如主字之法，出使者皆带牌，有金、银、木之别。”<sup>[14]</sup>李元昊在指挥兵马、管理国家事务中大量使用牌符，《宋史·夏国传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内有相似的记载：“（元昊）发兵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。”<sup>[15]</sup>梁太后幽禁秉常后，诸酋用兵自固，“乙埋数出牌招谕，不从，国内大乱”。

西夏时期牌符的材质，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内保存了一部分，可推断出大致有四种：1、银质牌符。《宋史·夏国传》载：“（元昊）发兵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。”<sup>[16]</sup>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规定：“诸人执符而折之，曰我带银符语及所领符不带腰上而置家中等，一律徒三年。”<sup>[17]</sup>2、铜质牌符。目前出土的西夏牌符多以铜质为主，如上文介绍的诸铜牌等。3、木质牌符。“宋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陕西宣抚使韩降遣将出麟府，破贼马户川，斩馘数千，获绣旗、木符、领卢印。”<sup>[18]</sup>4、纸质牌符。西夏应该还使用过纸质牌符，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卷13曰：“诸人执符出使处，不许藏符于怀中，致符面上纸揉皱折叠，倘若违律藏符于怀中，又揉皱面上纸等，有官罚马一，庶人十三杖。”<sup>[19]</sup>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数处提到的“头字”、“捕骑头字”，可能也为纸质驿券。

牌符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物，历史上在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生活等方面被广泛使用。唐、宋、西夏、辽、金及以后的蒙古帝国时期，牌符种类繁多，用途广泛。西夏的牌符制度与同期辽金的牌符制度大致相同，主要用于宫廷守卫、军事活动及对外使节中。一般由皇帝亲授，可以调动驿马，索取物资，体现出与军事有关的诸多层面系统而严密的管理体系。在对外使节中，这类牌符是国家及帝王的象征，在邻国中亦有很高的地位，代表国家的权威。国家以律法的形式对牌符实施严格的管理，铜牌的监制与使用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。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关于牌符制度的资料很少，至今其种类、功用尚不完全清楚。关于西夏牌符问题的研究，还需要文物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及对文献进一步解读的佐证。

[1]陈育宁等编：《中国藏西夏文献·金石卷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73-84页。

[2][3][17][19]史金波，聂鸿音，白滨：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，法律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71页。

[4]同[2]，第496页。

[5]同[2]，第323页。

[6]同[2]，第472页。

[7]同[2]，第475页。

[8]转引自史金波，白滨，黄振华：《文海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416页。

[9]梁松涛：《西夏文〈敕牌赞歌〉考释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2008年3期。

[10][11]《宋史》卷154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1990年，第3594页。

[12]同[10]，第3595页。

[13]《辽史》卷57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1996年，第915页。

[14]明·陆辑：《古今说海》卷15，台北广文书局，1968年。

[15][16]同[10]，卷485，第13995页。

[18]宋·杜大珪：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》卷10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〔责任编辑：许璐梅〕